

北朝佛教与民族关系*

黄夏年,于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100021)

[摘要]北朝是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历史时期。北朝时期,北方地区多民族聚居,其文化由此而表现出极强的融合性。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是北朝各族人民共同信仰的精神寄托。北朝佛学研究成果丰富,以译经最为注目。语异华戎、教分权实的佛教文化,在北方戎华两族之间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走出了一条互鉴互融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北朝夷夏之争的独特风貌。离开了对“心”的改造的政权,肯定不能长治久安,所以“治民之本”最重要的是从观念上去改变民族的思维。“四姓出家,同一释种”,这一佛教理念在北朝社会起到了推动民族和解的作用。北朝佛教的超越性,使其立足本位,向四方辐射,一乘宣教,殊途同归。

[关键词]北朝;民族佛教;夷夏之争;超越性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93(2020)03-015-07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明,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早在周朝,中原地域为特点的华夏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四夷”,共同开启了我国多民族的“夷夏”历史。随着“中国”的版图扩大和华夏与“四夷”的密切交往,夷夏之间界限也在不断地改变。到了公元4世纪至6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外来的佛教在中土的广泛传播,夷夏关系有了新的发展。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指出:“夫华人奉佛,本系用夷变夏。及至魏晋,佛教义学与清谈玄学同以履践大道为目的。深智之夷人与受教之汉人,形迹虽殊,而道躯无别。自无所谓华戎之辨。由凉州道人在于阗城中写汉文经典之事观之,东西文化交相影响,可谓至深。”^{[1](P257)} 汤先生所言“东西文化交相影响”,即夷夏民族与文化的交流融合。

一、北朝佛教的译经与实践

“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2](P2709)} 古人指出了中国南北两地不同的地域文化特点。南北佛教文化差别,大抵表现在南

方重义理、北方重实践的区别上。例如南方僧人对佛教理论给予深入考察,在佛性论、三论、《法华》与《华严》等方面确实取得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北方也不是没有学术,当时中国北方的长安逍遥园译场不亚于南方的译场,甚而超过南方金陵城内的扶南馆译场。西域高僧鸠摩罗什主持逍遥园译场时,僧人数量多达三千,其中鸠摩罗什的著名弟子也有多人。佛教谈“空”的般若类经典,汉译最早的是竺朔佛在洛阳译出的《道行般若经》,最系统的是鸠摩罗什在长安译出的“三论”,最完整的是玄奘在长安译出的六百卷《大般若经》。古人云:“道安所正经义,与罗什译出,符会如一,初无乖舛,于是法大著中原。”^{[3](P3029)} 译经活动的兴盛为北方佛教义学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后来佛教理论性很强的宗派如唯识宗、华严宗等都是在北方地区创宗的。古时人认为南方佛教兴盛皆因为北方佛教的影响,“有佛事于齐、晋之地久矣哉。所以不说于《三传》者,亦犹干宝、孙盛之史无语称佛,而妙化实彰有晋,而盛于江左也”^{[4](P12)}。

在佛教实践与应用上,北朝佛教则更加活跃。

* [收稿日期]2020-02-01

[作者简介]黄夏年(1954—),男,江苏常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佛教;

于光(1964—),女,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佛教学。

由于地理位置的影响,各民族军队相继在中原厮杀竞争,形成较长时期“鲜卑车马客”^{[5](P353)}的现象。佛教在这个大环境中得益,并发展壮大起来。曾经是西戎之地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和敦煌一直是佛教重镇,“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3](P3032)}僧人和佛事皆向内地流动,促使佛教发展很快。出家人太多,统治者只好下令不准五十岁以下的人出家。北魏法果和尚,被太祖道武帝礼遇,法果称赞太祖明睿好道,是当今如来,沙门当尽礼太祖,并说“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北魏的拓跋氏原是游牧民族,后来在平城(今山西大同)立朝。拓跋氏原来不信仰佛教,后来成为虔诚佛教徒,太武帝曾经下诏:“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可依凭。”^{[3](P3030)}在皇帝的支持下,整个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在洛阳的西域人达三千余人,皇帝为之建造了千余房间的永明寺,“远近承风,无不事佛”^{[6](P391)}。洛阳也是禅宗创生地,从南方来洛的南印度僧人菩提达磨在登封少林寺后山创立禅宗。洛阳成为北朝佛教的第一中心。北朝的另一个中心长安,先后创立了念佛的净土宗、南山律宗和密宗等实践性很强的派别。有关史料记载,后秦“姚兴托意佛道公卿已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7](P1651)}佛教在长安的盛态,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引人注目。第三个中心为邺城(今河南安阳等地),僧人佛图澄于此弘法。其弟子遍于郡国,劝统治者不杀无辜,“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于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8](P382)}。

北朝佛教盛兴是伴随着中国北方民族迁徙的高潮而起的。“前史称西域之俗,皆奉佛敬法,故大国之众数万,小国数百,而终不相兼并,内属之后,习俗颇弊,犹甚淳弱,罕行杀伐。”^{[4](P69)}北方地区先后出现了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号称“五胡”,陆续建立五凉(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四燕(前燕、后燕、北燕、南燕)、三秦(前秦、后秦、西秦)、二赵(前赵、后赵)、大夏等十五个北方政权,再加上南方的成汉,共计十六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虽然各国之间战争不断,但是在精神信仰方面却因佛教的影响而改变。“汉魏晋世似有若无,五胡乱治风化方盛。”^{[9](P154)}北朝地区佛教兴盛为汉魏晋世以来从没有过的现

象,成为改变社会风气的重要原因。史称“又五胡乱华以来,生民涂炭冤横死亡者不可胜数,其中设获苏息,必释教是赖。”^{[4](P69)}可知在战乱频仍的北方,佛教是各民族能够获得生息的重要依赖之一。“中州胡晋略皆奉佛”。在北方,佛教不仅是民族的信仰,还连结了各国各民族人民之间的感情。

二、夷夏论与戎华论之争与融合

汤用彤先生说:“魏晋以来虽因玄佛二家合流,而华戎之界不严。然自汉以后,又因佛道二教分流,而夷夏之争以起。西晋道士王浮作《化胡经》,提出此问题。”^{[1](P257)}如果说过去的“夷夏之争”只是中国大地的中原与周边的地区所进行的所谓“正朔”之争,“君言夷夏论者,东有骊济之丑,西有羌戎之流,北有乱头被发,南有剪发文身,姬孔施礼于中,故有夷夏之别。”^{[4](P47)}那么到了魏晋南北朝,南北两地的“夷夏论”开始朝着新的方向发展。汤用彤先生指出:“北朝道佛之争根据在权力。故其抗斗之结果,往往为武力之毁灭。南方道佛之争根据为理论。而其争论至急切,则用学理谋根本之推翻。南朝人士所持可以根本推翻佛法之学说有二:一为神灭,一为夷夏。因二者均可以根本倾覆释教。故双方均辩之至急,而论之至多也。”^{[1](P258)}

南方在传统地域文化的“夷夏之争”的基础上,发展出中外两种文化思想论争的“夷夏之争”。道儒二家提出,佛教是夷人相信的宗教,佛是西域外来之神,中国人不应奉祀外神。魏晋道士王浮伪作《老子化胡经》《西升经》等,言老子西出关外教化胡王,度桑门,建佛教。南朝刘宋道士顾欢作《夷夏论》,认为夷夏之间在穿着、葬礼以及伦理方面都不相同,“端委搢绅(儒士)诸华之容,剪发旷衣群夷之服也。”^{[4](P37)}所以,“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异,下弃妻孥,上废宗祀”^{[10](P931)}。儒士何承天则说:“中国之人,禀性清和,含仁抱义,故周孔明性习之教。外国之徒,受性刚强,贪欲忿戾,故释氏严五科之戒。”^{[4](P19)}齐世道士托名张融作《三破论》,指责佛教“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因此佛教“不施中国,本止西域。”^{[4](P50)}佛教徒撰写文章反驳道教的说法,说道教只是中国一方宗教,佛教则是广化宗教;老子是一方之哲,释迦是万神之宗。佛教传入中国,是佛陀教化中土,用“戎华说”与“夷夏论”抗衡。又道教主张长生不死,佛教以去漏为任;道经少而秽,佛典广而深等等,佛教徒认为,“佛据天地之中

而清导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国也。”^{[4](P47)} 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只有“井坎之渊”的眼界,没有远大的“江湖之望”;儒家的周孔有“雅正之制”礼俗,佛教则有超俗的佛法。所以儒家的“雅正之制”与四夷不同,只能影响到四夷地区,佛教因为超俗,其“德”可以推及八方。

北朝地区原有的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发生激烈碰撞,各民族政权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与相融。由此,民族大融合成为此一时期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佛典载:“戎华者东则尽于虚境,西则穷于幽乡,北则逾于溟表,南则极乎空阔,如来扇化中土,故有戎华之异也。”^{[4](P47)} “戎”者,除了代表“西戎”之外,还涉指西来中土的佛教,“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者”,将中华的儒家之人性说与西来的佛门之教法合在一起统称“戎华”。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国曾经“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戎族”就生活在广袤的西北地区。“戎华说”是北方的“夷夏论”,佛教则对这一理论的发展起到了特殊的促进作用。因为佛教是从西天佛国印度传过来,戎族生活在西域地区,虽然“穷于幽乡”,过的是游牧民族生活,可谓“世代流远,戎华音隔”^{[11](P365)},然而华戎制异,人神流别,例如“棺殓椁葬,中夏之风。火焚水沉,西戎之俗”^{[10](P931)}。外不同内,殓祭殊礼,荒夏服祀,不宜杂错,与传统中原儒家农耕文化有显著的差别。佛书说:“华戎自有不同,何者?中国之人,禀气清和,含仁抱义,故周孔明性习之教。外国之徒,受性刚强,贪欲忿戾,故释氏严五戒之科。”^{[4](P19)} 这时的“戎华论”已经上升为中外文化思想之争,而不再是过去的地域文化思想之争了。

中国佛教徒非常明了戎族佛教的作用,以及在这些地方生活的佛教僧人与居士对促进戎华佛教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例如佛教经典记载,天竺人耆域法师,“周流华戎,靡有常所”^{[8](P388)}。龟兹鸠摩罗什法师“语通华戎,识兼音义”^{[4](P50)}。凉州人竺佛念法师,“家世河西,通习方语,故能交译戎华,宣法关渭”^{[12](P99)}。凉州沙门宝云法师,“华戎兼通,言音允正,众咸信服”^{[13](P89)}。

总之,从东汉永平二年(前2)到隋开皇年间的六百年间,参与译经的“总其华戎道俗,合有一百八十二人,所译经律戒论大小乘三藏杂记等,凡二千一百七十一部,总有六千四百四十六卷。”^{[14](P485)} 对汉地文化而言,“内则树善凭福,外则应天顺民,故得华戎率从,群凶授首,仓库充牣,

封域廓清,若非内外福脍,岂能克定艰难者也。”^{[9](P175)} 对戎华两地佛教学说来讲,“是以《智论》有内外两经,《仁王》辩内外两论,《方等》明内外两律,《百论》言内外二道。若通论内外则该被华戎;若局命此方则可云儒释,释教为内,儒教为外,道无别教,宗结儒流,备彰前典,非为诞谬,详览载籍,寻讨根源。”^{[15](P372)} 可见佛教对戎华两地的文化交流以及社会发展的讨论,不在表面性质论说的不同,已经进入实质性的深层次问题了。

语异华戎、教分权实的戎华两族,其文化交流可以上溯到西周。周宣王三年(前825)曾经发动过征伐西戎的战争。虽然战争取得了胜利,但是却无法改变华戎杂处的情形。因为在长期的民族交流中,戎华两族已经从相互的战争改为互相学习与借鉴,发展成相互吸收、相互包容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之的传统。大家意识到“文武威风”不能取胜对方的,就像“有大方略者,不能据形胜以制戎狄”(钦定四库全书·经部·诗类张次仲《待轩诗记》卷七)一样。“南朝之学,玄理佛理,实相合流。北朝之学,经学佛学,似为俱起。合流者交互影响,相得益彰。俱起者则由于国家学术之发达,二教各自同时兴盛,因而互有关涉。盖魏帝信佛,始于道武,而道武即重经学。北方佛义之兴由于孝文,而孝文帝并益崇儒术。北方佛教信仰与南迥异,其经学崇尚与南方亦不同。”^{[1](P293-294)} 戎华两族只能以和为贵,以融而合,美美相彰,进而一体,走一条互鉴互融的发展道路。通过相行相融,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成为与南朝文化相并列的北朝文化。经济利益的诉求,决定了戒行严明、华戎敬异的戎华各民族的发展。据载北朝长安“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贵者崇侈靡,贱者薄仁义,豪强者纵横,贫窶者窘蹙。桴鼓屡惊,盗贼不禁,此乃古今之所同焉”^{[4](P817)}。长安经济繁荣,各种人和各个民族都有。他们主要是在皆为利来、皆为利往的目的下而在长安定居生活,繁荣的市场经济在给长安带来了各种利益的同时,也伴生出各种社会问题,这一切看似不正常实为正常的现象,其实正是人类社会的需要,也是政府想做的事情。古人云:“关中华戎杂错,风俗劲悍,欲以扬荆之化,施之函秦,此无异解衣包火,张罗捕虎,虽留兵守之,适足资敌耳。愿且按兵息民,以观其变,秦地终为国家之有,可坐而守也。”^{[17](P3706)} 战

争不是解决民族冲突的唯一手段。经济贸易的互通,文化的交流,有时比战争更能取得好的效果。军队只是用来作为保障民族和解的,而不是用来制造冲突的。古人已经看到这个道理了。

三、治民之本,先在治心

佛教传入中国又一次改变了中国宗教格局与文化结构。北朝地区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必经之路。经过众多知名和不知名的佛教徒努力,佛教不仅是戎华两族共同拥有的信仰之一,更重要的是它确实起到了推动各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古人指出:“发明春秋,莫谨于华戎之辨,故晋与白狄伐秦,及秦与白狄伐晋,皆不殊之,所以夷秦晋中国恶其族类不分之罪也。宇文立国,听命于夷,今又与突厥连兵,是其志在利人土地,而不知中国与夷狄不分,人类与禽兽无别,亦将沦胥为一无以戒乱华之祸矣。”(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史评类,朱熹《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三十四)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人才辈出、学术风气活跃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春秋各国称霸,相互之间战争不断,同时又互相利用,所有的战争都是出于某种目的,例如对人口与土地的掠夺,实力是最重要的。所以各国统治者不在意民族身分的鉴别,而且想方设法去增加自己的实力,把握打胜仗的机会。今天晋国可以联合白狄一起讨伐秦国,明天秦国又可能与白狄一起讨伐晋国,可见他们重视的是国家的管理权与统治权,如同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铭文刻的“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①,强调的就是国家的统治权与管理权。而这种权力则是建立在观念改变基础上的。例如北魏孝武帝西迁长安,雅乐废缺,于是征博天下,广采遗逸,又征稽诸典故,创新改旧,建立新乐。当时有一种从蜀地来的乐器,有人指出:“此箛于也。”^{[18](P432)}其声极振,可以将其纳入合乐之中。从这件小事即可看出,融于汉文化的民族,也经历了广采博收的过程,而不是全盘照搬。

民族之间的融和或征服,说到底思想的活动。苏绰给北魏太祖道武帝上表曰:“凡治民之体,先当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是以称治民之本,先在治心。”^{[18](P382)}苏绰指出了“治心”在一个国家政权中的重要作用,离开了对“心”的改造的政权,肯定不能长治久安的,所以“治民之本”是要从观念上去改变一个民族的思维才是最重要的。从另一个角度言,强调民族区别

的“夷夏之争”与内外有别的做法,不过就是“不使之得与中国等”(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史评类,朱熹《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二十)的思维,即异族人只能是被统治者,不能与统治者拥有同样的权力。古人指出这是“此固纲目、贵华贱夷之意”(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史评类,朱熹《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三十四),所谓“纲目”是指朱熹编纂的《资治通鉴纲目》,该书褒贬春秋,“贵华贱夷”,明辨伦理纲常,强调“正朔”,故而受到史家的批评。例如北魏献文帝拓跋弘(454—476)时期,一千余家蠕蠕(柔然)居于高平、薄骨律二镇,为了防止这些蠕蠕叛走,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镇将郎育等奏请将他们徙置于淮北地区。献文帝下诏许之,派杨椿做使节前往劝说。杨椿上书给献文帝曰:“臣以古人有言: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荒忽之人,羸縻而已。是以先朝居之于荒服之间者,正以悦近来远,招附殊俗,亦以别华戎、异内外也。今新附者众,若旧者见徙,新者必不安。不安必思土,思土则走叛。狐死首丘,其害方甚。又此族类,衣毛食肉,乐冬便寒。南土湿热,必将尽。进失归伏之心,退非藩卫之益。徙在中夏,而生后患。愚心所见,谓为不可。”^{[3](P1286)}杨椿的看法是对的,“贵华贱夷”思维的最大坏处是在制造人民间的对立,原住民严重地抵触新附民后,逼着新附民重新反叛。蠕蠕已经习惯了只穿毛氅,吃着肉,在寒冷的冬天生活,现在让他们到南方湿热地区生活,肯定最后都会死在那里,生活不适宜将会让蠕蠕不得不反,后来事实证明,迁徙济州、缘河居之的蠕蠕,“果悉浮河赴贼,所在抄掠,如椿所策”^{[3](P1286)}。

四、四姓出家,同一释种

佛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受海洋文明的宽广境界之影响,将自己喻为“佛海”,并且建构了各种各样的“海”。例如“出生长养大悲之力,除生死苦,游生死海而无疲倦,摄取众生海,令住功德海,得一切法智海光明,见一切佛海,度一切智海。”^{[19](P714)}“入于大海,因为说法,悉令欢喜,离生死怖,入一切智海,竭爱欲海,逮得三世光明智海,度一切苦海,清净一切众生心海,严净一切诸佛刹海,遍游一切十方界海,无所障碍;知一切众生诸根愿海,随顺一切众生行海,知一切众生随所应海。”^{[19](P714)}这些不同的“海”之称呼,是佛教自建的大格局写照。因为有了这种大格局,佛教才能够传法到整个世界,从而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

一,摄受许多民族,影响一些国家与民族的文化。

释迦牟尼是在反对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基础上建立佛教的。“四姓出家,同一释种”,则是佛教平等思想的最好表述之一。由于种族、经济、政治、知识、宗教和地位等原因,使每个国家或社会都存在种族不同,主次分别,阶层林立,信仰固定的不同群体,从而造成了整个社会出现了以某一种族群体为主,流行某种主体信仰,有一定的经济地位,代表某一集团政治诉求等情况。其结果就会产生自认出生种族优越、控制主流文化、据有高层地位和拥有重权的高层阶层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群体。印度种姓制度明显滋生了这种社会,所以才受到生活在社会底层或某些有进步思想的“沙门”反对。

从地域性说,佛教有强烈的地方文化特点,是与当地文化相结合的典范。《魏书·司马叡传》记载:“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貉类云。巴、蜀、蛮、獠、溪、俚、楚、越,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江山辽阔将数千里,馥羸靡而已,未能制服其民。有水田,少陆种,以罟网为业。机巧趋利,恩义寡薄。家无藏蓄,常守饥寒,地既暑湿,多有肿泄之病,障气毒雾,射工、沙虱、蛇虺之害,无所不有。”^{[3](P2093)}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僧人曾经向北魏皇帝报告:“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3](P3036)}佛教说印度有东流伽河,从阿耨达池银牛口流出,绕池一匝,入东南海。南信度河,从阿耨达池金象口流出,绕池一匝,入西南海。西缚刍河,从阿达池琉璃马口流出,绕池一匝,入西北海。北徙多河,从阿达池颇肢师子口流出,绕池一匝,入东北海。四河四海最终汇入大海,就像四姓同归为释种,故佛经云“四河入海,无复异名;四姓出家,同称释氏”。

中国人早就知道佛教有超级化物的能力。袁宏《后汉纪》曰:“天竺有佛道焉,能化通万物,而大济群生。”^{[20](P356)}可知“化通”就是佛教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在中国则转换为“圆融”或“融通”的形式。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文化进入一个全新国度,它既要高扬自己的风格,强调与众不同的特点,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存在感,同时又要表现出开放的心态,强调特有的圆融理论来显示自己的博大胸怀。佛经说“四姓出家,同一释种”,就包含有社会性、人间性、平等性与地域性等多种因素。从社会性来讲,印度社会分为四个阶层,即:一婆罗门,为宗教师;二刹帝利,为王公贵族;三吠舍,为

商人;四首陀罗,为农民。此外还有达利特,是贱民,亦称为“不可接触者”,不论种姓出身如何,只要接受佛教并出家的人,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经云。足指按地三千佛土皆见,及盲聋瘖哑,牢狱毒痛,皆得安宁。夫佛远近存亡,有戒无戒,等以慈焉。”^{[4](P13)}这是以“等慈”思想对印度种姓社会的反动,体现了佛教的平等思想。

从人间性而言,佛教这时已经深入到人间了。时人指出:“佛教两弘,亦有处俗之教,或泽流天下道洽六亲,固以协赞皇极而不虚沾其德矣。夫佛教存行各以事应,因缘有本必至无差者也。如此,则为道者亦何能违之哉?是故释迦之道不能超白净津梁,虽未获须陀,故是同国人所蒙耳。就如来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所谓宣教者所可拟议也,来示未能共求其理,便使大致慨然,故是未之谕也,想不惑留常之滞而谬,情理之用耳。”^{[4](P84)}佛教在社会上是全方位的,它既是出世间的,又有世间的,所以说它是“两弘”。其所谓的“处俗”之教,就是在人间广为宣化,泽流天下,道洽六亲的人间佛教。佛教存于人间,结缘于人间,是为天下人类所用的佛教。在中国佛教里,“四姓出家,同一释种”则被解释为凡是出家的人皆要以释为姓,据说这是中国僧人道安创造的传统,是中国传统宗法思想在佛教里的反映。然而“四姓出家,同一释种”在中国除了引入中国传统宗法思想与宗族社会的管理思想外,在北朝社会它可以起到推动民族和解的作用。通过“同一释种”的理念,出家人之间以佛教为联结点,拉近了不同民族佛教徒之间的感情,“以佛教信仰促合解”成为多民族社会的又一重要手段。

五、民族佛教的超越性

佛教之所以能在夷夏论与戎华论之争的活动中经受了理论的“批判”与行政的“消灭”而坚持下来,最后得到了更大发展,成为社会流行的最重要之私信仰,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的特殊理论与佛教所建立的民族信仰命运共同体,其理论基础可以在南北朝时期译出的佛经当中找到。

佛教是诸宗教里思辨性很强的宗教。古代僧馥法师说佛教理论特点是:“论缘性则以二谛为宗,语玄会则以权智为主,言菩提则以无得为玄,明发意则以冥期为妙,婉约而弘深,莫不备矣。”^{[12](P65)}佛教博大精深,认识事物有“真谛”与“俗谛”,解释深奥的学说就有权智方便说法,解脱觉悟以无得为境

界,以克期取证为妙道,理论弘深且广,为人类智慧结晶。佛教理论“与废更迭,理自应机,并从世运”^{[9](P155)},具有其超越性与人间性两大特点。对佛教而言,所谓“超越性”是指佛教的解脱境界并不是停留在某一顶点,而是以超越一切为最终的目的。例如一神论把宗教定位在最高的一神之万能性上,整个世界皆是由此“神”所创生。佛教则把超越一切作为最高的境界,到了这个境界有无都不存在,同时又也涵纳了所有的存在,呈现出开放性且无边际的虚空特色。佛教把世界看成虚幻不实的,诸事诸物都是由“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缘起关系所决定的,任何事情都是处在了生住异灭的无常过程之中,同时又有作为互为条件的缘起关系之实在,所以佛教有“渊博富弘,温而弥旷”^{[21](P1)}和“道无不由,法无不在,譬彼巨海,百川所归”^{[21](P1)}的特点。超越性让信众摆脱了民族身分的羁绊,从而拥有了更广的眼界与心理承受能力,例如大乘佛教的认识论是不二的,这是说既是承认现实世界的存在,但是又看到它的本质是空性的,即佛经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22](P749)}之不二法门认识。它指出了世界的虚幻性,同时又要超越虚幻而成佛作为最终目的,故佛经人生与世界来说:“此人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22](P750)}对世界而言,“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22](P751)}。所以佛教徒可以超越了自身认识的障碍,拥有更高的胸怀与更广的眼界。

超越性使佛教成为世界宗教之一,一直在世界各地流传。超越性的佛教是没有边界的宗教,跨过了国家与民族的樊篱。北朝佛教的超越性,使其立足本位,向“南化则滨,□启禅心。西涉则胡主启颡,北训夷狄体善,东据则现生季俗”^{[23](P206)}。四方辐射,即以北朝佛教为中心而向东西南北四方发展。北朝佛教的超越性发挥了“权教无方不以道俗乖应,妙化无外岂以华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译共解,一乘敷教,异经同归”^{[4](P51)}的特点,方便权应不受限制,不论道俗的身份如何,不讲地域方向位置,也不强调华戎民族本色,只要是信仰佛教的人,大家都可以共解,一乘宣教,殊途同归。

佛法无边,格局广大。“理深语大,非近情所测。时远事深,宁小机欲辩。岂以一世之局见,而

拒久远之通议,封迷忽悟不亦过乎!”^{[9](P154)}佛教的大格局囊括了世间与出世间的一切,远则涉及宇宙,近则涉及人我;前涉及世界的产生,后则涉及人的来世;浅则涉及人之生活,深则探索心灵的变化;远达五洲,近择当下。犹如“诸大菩萨行于生死烦恼大海,无所染着,离邪见海,入实法海,以善方便摄众生海,住一切智海,灭一切众生诸放逸海,善分别知时、非时海,善方便知化众生海”^{[19](P714)}的博大品格,就是佛经也具有超迈的品质,“彼佛经也,包五典之德,深加远大之实,含老庄之虚,而重增皆空之尽。高言实理肃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如风,非圣谁说乎,谨推世之所见,而会佛之理为明。”^{[4](P9)}佛教的“超越一切”“同一释种”的思维方式进入中国,与儒道两家文化相接,化解华戎之间的矛盾,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与操作思路。中国佛教被转换成“融摄性”的佛教,较好地解决了因民族问题而产生的各种矛盾,充分利用佛教信仰的“超越性”的大平台,将各种信仰佛教的民族纳入一个统一的“信仰命运共同体”之中。在这个大平台上,各民族“超越”了本民族认识的狭隘,例如佛像崇拜是佛教徒共同遵守的规定。在北传佛教里面,汉式佛像是汉孝明帝在洛阳建立白马寺始就开始传入。“自晋魏(北朝)六朝以至于宋,代与西国通和,公私往来,时时不断,故多得西国佛像。而唐之玄奘法师,遍历五竺境,共十有七载,瞻礼世尊过化之地,综通其声教,《大般若》等经千有余卷,金玉佛像百什余躯,俱以大象载归。其像之精妙,皆阿育王等所造者焉。盖自汉以来,凡欲造佛像者,皆取西来像为模。工行家,祖述相传,此所谓汉式者也(或以谓唐式)。”^{[24](P939)}佛教有各种派别,各派有自己的经典与教说,但是各派佛教徒都尊重佛像。这是以精神信仰作为基础,民族文化作为因子,互相交流,同勉共励,真正把“以信仰促交流”做到实处,推进各民族之间的互鉴共进,进而创生出多民族的中华佛教。所以古人说:“佛国之伟,精神不灭。人可成佛,心作万有,诸法皆空,宿缘绵邈,亿劫乃报乎。此皆英奇超洞,理信事实,黄华之听,岂纳云门之调哉!”^{[4](P9)}佛教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的精神是永存的,人可以与佛等同,心中装有了宇宙,又可以显示空门,一切都是宿缘所报,突显了英奇超远、理信之性的境界,这远不是中国传统中的黄华曲调、云门之调所能比拟的。佛教有了这个大格局,就可以将各个民族平等一如地纳入在

一个平台之中,从而促成民族之间的交流,推动各民族之间的和解,完成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过程。

注释

- ① 1963年在陕西宝鸡市贾村出土的一口“何尊”上的铭文。铭文写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意为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后,就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报告上天:“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

参考文献

- [1]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2] 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3]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 释僧祐.弘明集[M]//大正藏:5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 [5] 令狐德棻.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 [6] 心泰.佛法金汤编[M]//大正藏:8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 [7] 舒其绅.西安府志[M].何炳武,校点.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 [8] 慧皎.高僧传[M]//大正藏:5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 [9] 道宣.广弘明集[M]//大正藏:5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 [10] 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 [11] 释道世.法苑珠林[M]//大正藏:53册.台北:新文丰

- 出版公司,1983.
- [12] 释僧祐.出三藏记集[M]//大正藏:5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 [13] 费长房.历代三宝记[M]//大正藏:4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 [14] 释法琳.破邪论[M]//大正藏:5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 [15] 释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M]//大正藏:5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 [16] 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17] 司马光.资治通鉴[M].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
- [18] 令狐德棻.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
- [19] 大方广佛华严经[M].佛驮跋陀罗,译//大正藏: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 [20] 沙门志磐.佛祖统纪[M]//大正藏:4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 [21] 长阿含经[M].佛陀耶舍、竺佛念,译//大正藏: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 [22]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M].鸠摩罗什,译//大正藏: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 [23] 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M].上海:线装书局,2008.
- [24] 佛说造像量度经解[M].工布查布,译//大正藏:2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责任编辑 张福安)

Buddhism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HUANG Xia-nian, YU Guang

(Institute of World Religion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1, China)

Abstract: The Northern Dynasties is a historical period when ethnic minorities established their political powers in the Central Plains.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here were many ethnic groups living together in the northern area, and the culture of this period showed strong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ation. Buddhism, as a foreign religion, was the common spiritual sustenance of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In this period, there were many achievements in Buddhist research, among which the translation of sutras was the most important. The Buddhist culture, which was in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included “tentative & real” thoughts, had extensive and in-depth exchanges between the Han nationality and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north, developed a path of mutual learning and integration, and formed a unique situation of competition between Han nationality and the ethnic groups during the North Dynasties. A regime witho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heart” can’t be stable for a long time. Therefore, “the foundation of governing the people” is to change the national thinking from the concept. The Buddhist concept of “all surnames are equal” played a role in promoting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he transcendence of Buddhism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made itself based on the origin, radiate to all directions, preach with the theory of “one vehicle”, and reach the same goal by different means in the end.

Key words: Northern Dynasties; national Buddhism;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Han nationality and the ethnic groups; transcendence